

「文章四友」新論： 以李嶠、崔融之應用文書寫為探討中心

曲景毅

南洋理工大學
中文系
助理教授

摘要

文學史上向以李嶠、崔融、蘇味道及杜審言並稱「文章四友」，卻甚少關注其文章成就。本文以崔融、李嶠應用文書寫為探討中心，指出高宗、武后時期以崔融、李嶠為代表的「大手筆」作家因襲六朝綺靡華瞻的風氣，風雅之道掃地，廟堂文風一度頗為不振。就文章的內容而言，徇功稱美、頌德稱獎的華而不實之辭大行其道，較為缺乏政教意義與真情實感的流露。李嶠、崔融的頌體文盡顯詞臣面貌，因而時代風會祥瑞觀念大量體現。當然，他們又是頌體與諫議之複合體，二人的奏議文為其文章增添了一種實在與亮色。總體來說，李嶠是撰寫謙詞雅語的行家裡手，頌揚主上極盡鋪張華麗之能事；與其相類，崔融亦立辭比事，潤色太平之業，但崔融的文章引經據典，博聞廣記，擅長使用「連珠體」式的排比句，尤喜愛三字句間插句中，句式富於變化。以文學成就而言，崔融較李嶠略勝一籌。本文由此申發認為「文章四友」中的「文章」兼指詩賦與文章，且偏重於指文，「崔、李、蘇、杜」的排序與其文章成就及在當時被認可的程度基本吻合。

關鍵詞：文章四友、李嶠、唐代應用文、崔融

壹、緒言

文學史上向以李嶠、崔融、蘇味道及杜審言並稱「文章四友」。「文章四友」最早出自《新唐書·杜審言傳》云：「（審言）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為服總云。」¹計有功《唐詩紀事》卷6杜審言條、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4上〈別集類上〉均有類似記載。可見，在宋代這種說法已經成為普遍事實。四人先後由政治的邊緣地帶輾轉進入武后政權的中心，成為武后新興政權中以文詞得名的典型。崔、李、蘇、杜互有交往，²以前的文學史多將他們放在一起討論四人的詩歌成就。崔融《全唐詩》存詩一卷18首，《全唐詩補編·補逸》卷3補兩首；蘇味道詩《全唐詩》存詩一卷16首；李嶠《全唐詩》存詩五卷209首，³《全唐詩補編·續補遺》卷1補一首，⁴其中以第120首〈雜咏詩〉和〈汾陰行〉最負盛名，杜審言《全唐詩》存詩一卷43首，特別是杜審言以詩著稱，亦以詩恃才放曠，杜甫亦有「詩是吾家事」、「吾祖詩冠古」等名句，受此影響，後世認為「文章四友」指初唐詩壇的四位風格趨近的宮廷詩人，⁵從而甚少注意其真正的文章成就。筆者以為這種看法值得商榷。

如何理解這一稱謂中的「文章」涵義？「文章」一詞，最早指錯雜的色彩和花紋。許慎《說文解字》云：「文，錯畫也，象交文。」「章，樂竟為一章。」「彰，文彰也。」這反映出漢人對這一詞語的理解。事實上，從現存文獻來看，到漢代人們才用「文章」來指稱文字。如《史記·儒林傳》云：

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喻下。⁶

此處是現今能找到的「文章」合稱的第一例。《漢書·藝文志》云：「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王充云：「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

¹【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5），卷201，冊18，5736。

²四人交遊詩可資參證，共8首，分別為杜審言〈贈崔融二十韻〉、〈贈蘇味道〉、〈送崔融〉；崔融〈留別杜審言並呈洛中舊游〉；李嶠〈奉和杜員外扈從教閱〉、〈和杜學士江南初霽羈懷〉、〈和杜學士旅次淮口阻風〉及〈酬杜五弟晴朝獨人坐見贈〉。

³其中與宋之問詩相重六首；與張喬相重兩首；與李義、徐彥伯、韋應物各相重一首，11首中有九首為李嶠所作，參見王啟興。〈初唐三詩人重出詩篇考辨〉，《武漢大學學報》，1期（1999），78-80。

⁴《全唐詩續拾》卷9陳尚君比刊《佚存叢書》本《李嶠雜咏百二十首》與《全唐詩》所載者，發現差異較大，其中〈池〉、〈箏〉二詩完全不同，故另錄之。

⁵關於此點，許多文學史教材及學術著作皆持此說，此處不一一述及。

⁶【漢】司馬遷：《史記》（北京市：中華書局，1959），卷121，冊10，3119。

奇，其稱不由人。」⁷《漢書·揚雄傳贊》云：「（雄）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⁸漢人所云「文章」包括詔、書、律、令、賦、頌、記、奏、經、論、箴等文字作品，揚馬之徒均以文章顯天下。三國曹丕《典論·論文》稱：「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其所說「文章」包括奏議、書論、銘誄及詩賦。《南齊書·文學傳論》云：「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⁹其所說「文章」包括各體詩文。這種概念一直延續至後代，唐代的「文章」概念亦復如此。具體到「文章四友」之「文章」應包括「詩」與「文」兩部分，其在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應從這兩方面加以認定。沈既濟〈詞科論〉云：

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寢以成風。¹⁰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以文章選士」是唐代選舉制度的重要改革。從以上言論可以看出當時「文章」二字對於士子的影響，士大夫以擅長文章為晉身的方式，故而亦以文章聞名於士子群體之中。由於蘇、杜均無文留存，故本文擬從李、崔之應用文書寫成就這一角度將「文章四友」之「文章」涵義釐清，還原文學史的真實。

貳、雅頌之盛與李嶠、崔融的詞臣面貌

貞觀以後，文風的發展並沒有按照初唐太宗、魏徵君臣所宣導的革新一路發展下去，而是對六朝風尚變本加厲的追襲。學術界談到高宗武后時的唐代文學（無論詩文），多認為「初唐四傑」、陳子昂分別以剛健清新和風雅興寄、漢魏風骨為宗旨對浮靡文風進行了改革，但實際上這種改革的呼聲仍僅局限於下層，對文壇的影響力需要重新估價，¹¹當時的文學並未下移，上層統治階級的宮廷文學仍是文壇的主流，不但沒有繼續唐初太宗魏徵君臣所宣導的文質兼融的文風，反而因襲六朝綺靡華瞻的風氣，風雅之道掃地，廟堂文風一度頗為不振。就文章的內容而言，徇功稱美、頌德稱獎的華而不實之辭大行其道，缺乏政教意義與真情實感的流露。作家的生活面過分狹窄，侍宴、朝拜、遊冶、文牘成為宮廷文人的主要生活內容，因而創作個性泯滅在時代共性中。

魏徵《隋書·文學傳論》批評南朝梁代文風時稱：

⁷【漢】王充，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卷28，1151。

⁸【漢】班固：《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62），卷87下，冊11，3583。

⁹【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2），卷52，90。

¹⁰【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卷476，冊5，4868。

¹¹盧藏用評價陳子昂的作用稱當時「天下翕然，質文一變」（〈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這種論斷有言過其實之疑。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¹²

當時江南宮體詩文，「爭馳新巧」，辭繁意淺，雕章縟句，尤重典故與聲韻的雕琢。這種文風影響到唐初，魏徵所述的關右即指山東，李嶠與崔融為山東大族出身，¹³受此風氣影響甚深，高宗及武后長期以洛陽為東都，大量文辭之士雲集洛陽。張說曾評價武后時文風云：

自則天久視之後，中宗景龍之際，十數年間，六合清謐。內峻圖書館之府，外辟修文之館，搜英獵俊，野無遺才。右職以精學為先，大臣以無文為恥。每豫游宮觀，行幸河山，白雲起而帝歌，翠華飛而臣賦。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¹⁴

大臣們「以精學為先」及「以無文為恥」是整個社會風氣由開國時的儒學化向文學化轉化的表現，而「雅頌之盛」的代表即是御用文人李嶠與崔融。大肆的鋪排與誇張的渲染成為上層宮廷文人的普遍特色，崔、李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完美的形式與空洞的內容相結合，內容的單一淺薄並不影響頌者的文字精美，實際上他們扮演的是南朝詞臣的角色，是六朝錦色的復歸。

楊炯〈王勃集序〉中云：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揉之以金玉龍鳳，亂之以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¹⁵

這一評價確乎抓住了當時文風的主要特徵，杜曉勤在分析龍朔文場變體時指出，這種變體有上官儀的上官體也有許敬宗的頌體詩，¹⁶這是就詩歌而言。而其實，楊炯的這段評論恐怕是針對整個文學風尚而言，與許敬宗頌體詩、上官儀的綺錯婉媚詩風相類，文風也走向了綺麗的極致。葛曉音指出：許敬宗所創造的「典奧華麗，極盡雕飾」的「張揚誇飾」的文風與「後進文人翕然效之而形成的誇誕之體」在武后時頗為流行，對宮廷的影響「主要表現為詩

¹²【唐】魏徵等：〈文學傳論〉，《隋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3），卷76，冊6，1730。

¹³李嶠為趙州贊皇（今屬河北）人，崔融為齊州全節（今山東章丘）人。

¹⁴【唐】張說：〈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載於《全唐文》，【清】董誥等（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卷225，冊3，2275。

¹⁵【唐】楊炯撰、徐明霞點校：《楊炯集》（北京市：中華書局，1980），卷3，36。

¹⁶參見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北京市：東方出版社，1999），195。

賦駢文的辭藻競相追求華麗誇飾」。¹⁷李嶠與崔融綺錯婉媚與歌功頌德為一爐，研章摘句，思郁文繁，他們是龍朔之後文壇的主將和領袖人物，後人稱「崔融、李嶠及張說，皆為一時宗匠」。¹⁸他們居高位而揚頌辭，是當時台閣體的典範，頌體文的典型代表。

李嶠與崔融是當時文壇「大手筆」。¹⁹李商隱〈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談及歷代「大手筆」作家時云「高宗有臣曰嶠，曰融」，²⁰認為李嶠與崔融為高宗朝的「大手筆」作家，但實際上二人均受到武后的提攜獎掖而成名。李嶠於武后時期為鳳閣舍人，深受武后稱賞，《舊唐書·李嶠傳》云：「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為之。」²¹武后亦歎賞崔融所撰〈啟母廟碑〉，命崔融撰封禪後的朝覲碑文，《舊唐書·崔融傳》云：

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敕付融。²²

李嶠（645～715），趙州贊皇（今屬河北）人。歷仕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及玄宗五朝，曾先後擔任鳳閣舍人，參修國史，禮部侍郎、尚書，修文館大學士等職務，聖曆、長安及神龍三度拜相，一度為中書令，位極人臣，封趙國公。史稱其「少負才華，代傳儒學」，²³與崔融連同當時的蘇味道、宋之問、閻朝隱等人，氣質接近，都是武周朝的御用

¹⁷參見葛曉音。〈論宮廷文人在初唐詩歌藝術發展中的作用〉，載於《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葛曉音（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9-30。

¹⁸【宋】王欽若等（編纂）：《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840，冊11，9969。

¹⁹「大手筆」一詞語出《晉書·王珣傳》，最初是指有學識、有文采、為皇帝賞識的文章家代表皇帝草擬的朝廷公文。由於朝廷所需的這些公文一般都由專人撰寫，所以「大手筆」的稱謂逐漸由某類文章進而指稱撰寫這類文章的文章家。在唐代，「大手筆」涵義仍然不出荷明天子旨的範圍，諸「大手筆」作家在文章風格上頗為相似。在唐代，被史書或時人稱作「大手筆」作者有：陳叔達、顏師古、岑文本、崔行功、李懷儼、蘇瓌、李嶠、崔融、張說、蘇頌、常袞、李吉甫、李德裕、令狐楚、韓愈及皇甫湜16人，不同時期皆有以「大手筆」而著稱者，真可謂是一代有一代之「大手筆」。關於唐代「大手筆」作家的相關情況，可參見曲景毅。〈唐代「大手筆」作家考論〉，《輔仁國文學報》，32期（2011）：75-103。關於這些作家的文學論述與文本分析及「大手筆」作家之綜合討論，可參見曲景毅。〈「大手筆」作家與唐代儒學的三次復振〉，載於《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三十一輯（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171-187；曲景毅。〈論李德裕的公文寫作〉，《國學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卷27，47-74；曲景毅。〈試論中唐常袞制書之文章價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5期（2012），165-186；曲景毅。〈論唐代文章之演進：以「大手筆」作家為視角〉，將載於《復旦大學第三屆中國文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13）；曲景毅。〈唐代「大手筆」作家之研究路徑與學術空間〉（《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已呈送審核）、〈論「燕許大手筆」張說蘇頌之應用文寫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南大語言文化學報》，已呈送審核）、〈論唐代「大手筆」作家之聲名消解與歷史遮蔽——從宋《唐文粹》、明《唐文鑒》、清《唐駢體文鈔》的編選談起〉（《文學遺產》，已呈送審核）等。

²⁰【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779，冊8，8132。

²¹【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5），卷94，冊9，2992-2993。

²²同上註，3000。

²³【唐】劉肅，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文章》（北京市：中華書局，1984），126。

學士，共同纂修《三教珠英》，諸珠英學士以李嶠為首，說明他在當時文壇的領袖地位。「其仕前與王勃楊炯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²⁴李嶠「久宦成資」，累居台輔，高壽70，且著述不輟。現存文159篇。²⁵

崔融（653～706），字安成，齊州全節（今山東章丘）人。《舊唐書·崔融傳》云：

中宗在春宮，制融為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曆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啟母廟碑〉，深加歎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覲碑文。²⁶

他曾擔任著作佐郎、著作郎、鳳閣舍人、知制誥等職，並長期兼修國史。他因撰寫則天的哀冊文而用思精苦，發病而卒，可見「大手筆」文字對人精神智力之耗費，特別是給皇帝撰寫哀文，要求達到完美境地，為成就一文而殫精竭慮，付出生命的代價。崔融學識廣博，才智超群，以文章顯，長期擔任知制誥職務，李嶠〈授崔融著作郎制〉稱其「長才廣度，瞻學多聞，詞麗揚、班，行高曾、史」，²⁷史稱其「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²⁸用語典麗，文雖數量不多，然篇篇精工，文采斐然。崔融今存文51篇。²⁹

〈自敘表〉是垂拱元年（685年）的上表自薦，李嶠仿照三國名相諸葛亮〈出師表〉之筆法文脈對自己文章事功進行概括總結，此文體現了其文章風格。相對於〈出師表〉之簡嚴，〈自敘表〉則滿是虛辭謙語，時刻不忘對主上的誇飾：

陛下以欽明撫運，齊聖握圖，冠千齡而首出，超百王而高視。德澤汪濊，典章明密，至道共八風俱翔，神功與四時並運。是以眾庶悅豫，符瑞胥螽，九服清夷，百蠻職貢。

這是李嶠多數文章的主要特點。³⁰李嶠對自己的文辭才能頗為自負，他在〈自敘表〉中稱：

臣曾涉經典，篤好文史，漸六藝之腴潤，馳百家之閭闔。至若操觚秉牘，紀事屬辭，雖竊比老、彭，誠未擬於先哲；而上追班、馬，敢自強於後進。

²⁴【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卷123，冊14，4371。

²⁵《全唐文》存文155篇，《唐文拾遺》補1篇，《全唐文補遺》第二輯補1篇，《全唐文補編》補2篇。

²⁶【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94，449，2996。

²⁷【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42，冊3，2448。

²⁸【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崔融傳》，卷114，冊13，4196。

²⁹《全唐文》存文48篇，其中兩篇誤收，《唐文拾遺》補一篇，《唐文續拾》補一篇，但缺文（《全唐文補編》補足），《全唐文補遺》補一篇，《全唐文補編》補兩篇，共計51篇。

³⁰李嶠亦有舒卷開合、自然靈動之作，如〈神龍曆序〉，高步瀛稱此文「典麗精實，仍寓疏宕之氣，故自可珍」。參見高步瀛。《唐宋文舉要》乙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2，1419。

他稱自己精通五經六藝，文史百家，學問雖不若孔聖先哲，但可比擬於老聃、彭祖，文辭可追漢代文章聖手司馬相如（或指司馬遷）、班固，而當代後進之辭士莫可及之。他將自己的文章器業與武后的升平治世聯繫在一起：

嵩高梁父，未修昭報之壇；禮官儒林，不輯昇平之頌：使鴻名有時而郁，良史靡得而稱，臣竊懼焉。昔成、康之隆，頌聲並作；武、宣之盛，文章間起。虞德茂而杞絳作歌，魯道興而奚斯有述：然後功業顯乎代，德音昭乎聲。若夫保馭中和，憲章大雅，通諷諭之旨，摠嗟歎之懷：此臣子之舊經，國家之前式，不可闕也。

「升平之頌」與「諷諭之旨」乃是其文章的兩個主要內容，其中前者無疑是其創作的主體。表文的結尾李嶠對文學功用這樣評價：

聽歌探頌，以觀四方之風；講藝論詩，以崇三代之式。第其科目，載之簡編，大以薦陳郊廟，報享成功；小以敷布樂章，潤色鴻業。³¹

這是其多數文章的主旨。崔融與李嶠在文章內容與主旨上很相似，他在〈大唐故中書令兼檢校大子左庶子戶部尚書汾陰男贈光祿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薛公（元超）墓誌銘並序〉稱頌薛元超：「立辭比事，潤色太平之業；述禮正樂，歌頌先王之道。」³²崔融自己的多數文字即是如此。目前學術界對於李嶠、崔融的文章甚少關注，故我們通讀二人的作品後分類予以論述。

參、「潤色太平」的頌體表文

劉勰云：「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文心雕龍·章表〉）表，即奏表，又稱表文，是臣屬給君王的上書。唐宋時多用四六文體寫成，表的用途較為廣泛，在唐代它取代了原來「章」「奏」等文體，用來謝恩、陳乞、勸進、辭官、慶賀及進獻等。李嶠與崔融的表文尤其突出，分別為94篇和39篇，占其文章總數的大半。

一、李嶠：「潤色鴻業」與謙詞雅語

（一）李嶠的表文多數均為代人捉刀，反映出御用文人的典型特徵，處處映顯著為武后

³¹【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46·冊3，2494-2495。

³²吳鋼（主編）。〈大唐故中書令兼檢校大子左庶子戶部尚書汾陰男贈光祿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薛公（元超）墓誌銘並序〉，《全唐文補遺》第一輯（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4），72。

稱帝而策劃的拜洛受圖、修建明堂、立天樞、封嵩山等規模宏大，極盡奢華的禮儀活動，大多都是趨時應制之文，以粉飾歌頌武周見長，從總體上體格卑弱，華而不實。如〈為杭州崔使君賀加尊號表〉，稱頌則天為「以天上天下之尊，為隆平太平之主」，對於武后稱帝極盡誇讚之能事，盡露諂阿之媚態：

不言而理，三階正而六氣調；不怒而威，萬寓清而百蠻服；延富壽於和平，制雍熙於易簡。懷恩慕化之黨，候雨占風；疇德瑞聖之符，非煙若霧；青襟咏歎於庠塾，黃髮謳吟於衢路。固可使堯舜擁桴，禹湯扶輅，踰賢劫而首唱，邈梵天而高視，豈登三咸五，邁古超今而已哉？嘉號初登。殊章備舉，鋪帝容而建皇極，大寶重光；撫乾軸而正坤維，洪爐再造。仙渙與祥風俱動，湛恩將游雷並作；緩姬文之獄，既削爰書；錫漢後之酺，且頒戎級。滂流之澤，出九掖而浸群方；拚躍之音，自三川而週四海。加以崇祇肅於梵宇，致嚴恭於清廟，申冤舉滯，而有善必甄；享德報功，而無文咸秩。規模粲而洋溢，道德純而布濩，豈徒朝野稱慶，觀美化之維新；故亦神祇降祥，見鴻基之載永。³³

表文全用駢體，文辭瞻美，雍容典雅，氣勢恢宏，但華而不實，文采富足而沒有實際內容。他頌贊武后對臣下的恩遇，如〈為汴州司馬唐授衣請預齋會表〉云：

陛下降視萬方，俯矜一物，衰老母虛羸之疾，慙愚臣煎迫之私，宏以不匱之思，布以非常之澤，使得暫辭藩岳，別梁郡之襜帷；旋赴京都，求越人之砭石。³⁴

針對武后嗜佛，投其所好，〈為朝集使等上尊號表〉、〈為百僚賀瑞石表〉、〈賀天尊瑞石及雨表〉等均能夠融道於佛，以適應主上之思想傾向。此外〈宣州大雲寺碑〉及〈洛州昭覺寺釋迦牟尼佛金銅瑞像碑〉二碑文，亦是武后大肆崇佛的產物。

李嶠長期為王公大臣代寫表文，久而久之，被公認為這一領域的能手，這也是其日後被尊稱為「大手筆」作家的重要因素。他經常為當時顯宦姚璹、宗楚客、婁師德等代言，還為武氏宗親代寫表章，為皇親國戚代言，李嶠總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滿足於達官貴人的各種需要，充分顯示其富於才思的一面，如〈為武攸寧辭奪禮表〉、〈為武承嗣等賀賊平後新殿成上禮食表〉、〈為皇太子請加相王封邑表〉等可窺見一斑。

作為當時的文壇盟主，李嶠詩文兼擅，其咏物詩「藻麗詞清，調諧律雅，宏溢逾於靈

³³【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46，冊3，2454。

³⁴同上註，2487。

運，密緻掩於延年」。³⁵長壽3年滿朝文武的獻詩中更是「唯嶠詩冠絕當時」，說明其詩歌頌德的本領在當時有口皆碑，唐玄宗晚年聽梨園歌其七言古詩〈汾陰行〉時有「李嶠真才子」的讚歎。李嶠的一些表文表現出他長於狀物，這與其擅寫咏物詩類似，如〈為杭州刺史崔元將獻綠毛龜表〉云：

伏見所部錢塘縣人聶幹，於市內水中獲毛龜一枚，修尾長頭，元甲綠毳，名掩於楚宗，狀奇於靈繹。雖六眸在首，未足尚其禎祥；五色成文，詎能齊其詭異？伏業著而自久，下芳連而暫出，美兼曠代，休踰群祉。³⁶

再如〈為司農卿宗晉卿進赤觜山鵲表〉等，充分說明了其咏物狀物的能力。他的表文文字精妙，語言優美，如〈為百僚賀日抱戴慶雲見表〉之「凱澤將膏雨共流，協氣與景風齊暢」；〈為百僚賀雪表〉之「榮樓棲檻，凝壁台之九重，落絮飄花，似芳林之二月」等。為了顯示自己的文采與學識，表文用典繁多，無一文不用典，如〈為百寮賀恩製錶〉乃是誅韋之後所作：

陛下傷澆、浞之為變，弔管、蔡之不臧，法雷電之威，誅而不怒；用《春秋》之義，斷必以情。擢其發而葬其屍，殲其魁而宥其黨，漢主三夷之法，黜而不行；秦王九族之刑，矜而莫用。³⁷

一方面謙稱自己「學術蕪淺，才藝寡薄」（〈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而另一方面，或云「四科函文，多謝於文學；七子登筵，有慚於詞賦」（〈謝撰懿德太子哀冊文降敕褒揚表〉），或有感而發「楚客之謠」、「潘生之思」（〈與雍州崔錄事司馬錄事書〉），或贊人尺牘「重以語成四教，文總六詩」（〈為何舍人賀御書雜文表〉），或如〈讓成均祭酒表〉之「況東序蟻學，稱為教化之宮；西膠虎門，實應文章之宿：論姬孔之制度，談夏商之損益」之類每句皆用典，讓人嘆服於其文章才藝和學識的宏博。

（二）李嶠是一個撰寫謙詞雅語的行家裡手，他每每端著雅正的身架，將一個簡單的意思長篇累句地用一大堆典麗雅致的虛詞套語進行表述，令人不得不嘆服其才思富贍。而且，這些虛詞並非單純的謙虛、貶低自身，而是在華麗的裝飾下將自己的才能、智慧及品行充分表達出來。有時難免虛偽做作之嫌，尤其表現在許多「讓官謝賞」的表文，如〈讓知政事

³⁵【唐】張庭芳：〈故中書令鄭國公李嶠雜咏百二十首序〉，載於《全唐文》，【清】董誥等（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卷364，頁3693。

³⁶【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45，冊3，2479-2480。

³⁷同上註，卷243，冊3，2462。

表〉、〈讓地官尚書表〉、〈讓麟台少監表〉、〈讓成均祭酒表〉、〈自內史再讓成均祭酒表〉等。讓官表文雖出於禮儀的需要，但李嶠的行文未免過分謙卑。他在許多表文中屢稱自己「虛受榮遇，迄無成績」、「植性愚陋，稟質庸疏」、「非親非賢，無藝無識」；對於皇恩常懷「不次之恩」、「無涯之恩」、「非常之恩」、「逾涯之恩」，故「以榮為憂」，給人以不實之感，讀之乏味，且缺乏新意，陷於陳套。李嶠文集中還有一些干謁上書，亦露諂媚之態。如〈上雍州高長史書〉稱頌高長史一段：

故其處則閉重元，坐虛白，龍盤鳳峙，桂郁蘭芬，下生川嶽之氣，上發星辰之象；其出則摘景光，吐文質，風雲相召，日月爭明，撫八翼而登太階，提七星而酌元氣。³⁸

不過是為了希冀引薦，不免有誇張過譽，但這種干謁文字對當時文人來說甚為重要，吹噓別人也需要本領和技巧，李嶠此篇即入選《唐文粹》卷88〈書十·自薦〉類，成為自薦體書信的範本。

李嶠的謙詞並非一概自貶，事實上有許多表文是謙中自揚，貶中自揚，李嶠每每稱自己如何「才闕行疏，藝殫術淺」，政事不通，「罕能治國」，其實這是正話反說，骨子裡他是頗以文詞經術自許的，這可從上文所舉〈自敘表〉對自己才藝的自誇就可明白。愈寫得卑微就愈是自矜的表現，這種謙虛的近於虛偽，似乎照見其性格本質。如〈讓鸞台侍郎表〉：

子雲以善屬文詞，始應夕拜，李真以妙通經術，方陪旦講。臣之愚陋，實畏友朋，產以奉帷幄之昌言，聯名賢之逸軌。且短才不齒，未減雙鳧之數；豐秩妄加，必喪群龍之績。³⁹

揚雄、李真以文詞、經術聞名，李嶠雖說自己不敢與之相比，但實際上正好需要反著理解。〈自內史再讓成均祭酒表〉稱「臣本諸生，階緣常調，幼趨詩禮，才學修身，長習文章，罕能經國。」⁴⁰分明是禮讓成均祭酒這樣的文學官職，卻稱自己沒有治國才能，而通詩禮，有辭章，這其實是在自許。

「讓官」表本是歷代均有的一種常見表文，在朝為官者每當升遷時照例都會上表讓官，於是「大手筆」如李嶠者就代不同階層的官員寫讓官表文，有讓台閣之職者，如〈為武承嗣讓知政事第二表〉、〈為王及善讓內史第二表〉、〈為王方慶讓鳳閣侍郎表〉、〈第二表〉、〈為楊執柔讓同鳳閣鸞台平章事表〉、〈為張令讓麟台監封國公表〉；有代讓刺史之

³⁸ 同上註，卷247，冊3，2498。

³⁹ 同上註，卷244，冊3，2466。

⁴⁰ 同上註，2474。

職表者，如〈為第二舅讓江州刺史表〉、〈為武嗣宗讓陝州刺史表〉、〈為竇教讓潤州刺史表〉；有代讓其他重要官職表者，如〈為李景讓天官尚書表〉、〈為歐陽通讓夏官尚書表〉、〈為楊執柔讓夏官尚書表〉、〈為歐陽通讓司禮卿第二表〉、〈為武重規讓司禮卿表〉、〈為崔神基讓司賓卿表〉、〈為宗楚客讓營繕大監第三表〉、〈為王遺恕讓殿中少監表〉、〈為第十舅讓殿中監兼仗內閑廄表〉、〈為武攸暨讓官封表〉、〈為武攸暨讓兼知司禮寺事表〉、〈為武嗣宗讓千牛將軍表〉、〈為武攸宜讓揚州都督府長史表〉；為公主駙馬代寫辭讓表者，如〈代公主讓起新宅表〉、〈為公主辭家人畜產官給料表〉、〈為裴駙馬讓官與父表〉；為道士代寫讓官表者，如〈為道士馮道力讓官表〉等。

除讓官表外，最能表達謙遜才能的還有謝表，如〈謝賜優詔矜全表〉⁴¹等。這些虛情假義的讓謝官表文，習慣性的矯情導致其為文缺乏真情實感，雖然富有華麗的辭藻、規矩的對仗及豐富的典故，但沒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讀一篇與讀多篇沒有太大的差別。

李嶠被稱為「文章宿老」，指其年事高，資格深，長期代人從事頌文的創作，至老不衰。他的表文均極盡鋪張華麗之能事，全力頌揚武后統治為升平盛世，言過其實，阿諛之態過於顯露，遭致時人的非議。《新唐書·李嶠傳》云：「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譏薄。」⁴²與崔融相比，同樣是歌頌武后，李嶠備受譏薄，也許是因為身為御史未能剛正不阿，直言極諫反而無原則的誇讚，實在有失身分。雖然其才思巨富，然亦不免語言的重覆，如〈代公主讓起新宅表〉之「實願歸師老氏，以止足自防；仰慕周公，將逸豫為戒」與〈為公主辭家人畜產官給料表〉之「敢忘周公逸豫之誠，深念老氏止足之言」，用語頗為相似。

清代蔣士銓云：「唐四六畢竟滯而不逸，麗而不適。」（《評選四六法海·總論》）觀李嶠的文章的確表現為麗而不適，華美有餘而遒勁不足，比之麗逸兼備的庾信文來說略遜，而內容單一空洞，體式完全的駢體對仗，使得文章千篇一律，少有變化。

二、崔融：「潤色太平」與為文華婉、句式多變

（一）崔融擅長「立辭比事，潤色太平之業」。⁴³前已述及，李嶠與崔融均是武后提拔獎掖而成名，然而相較而言，崔融一生的創作與武后的關係更為緊密。崔融早年曾寫有〈瓦松賦〉，文中即有「惟願聖皇千萬壽，但知傾葉向時明」，⁴⁴可見其創作旨趣。崔融一生與武后之帝業息息相關，在他的筆下武后稱帝乃承唐業，一脈相傳，不以為武周時期為改朝換

⁴¹同上註，卷246，冊3，2488-2489。另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5），卷26，冊上，327，補李嶠〈代群官謝恩表〉，實即此文。

⁴²【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卷123，冊14，4371。

⁴³吳綱（主編），〈大唐故中書令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戶部尚書汾陰男贈光祿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薛公（元超）墓誌銘並序〉，《全唐文補遺》第一輯，72。

⁴⁴【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17，冊3，2192。

代，稱其「顯承遺托，敬守前基」。他是武后的忠實代言人，是則天朝潤色王言、歌功頌德的代表。如武后嗜佛，崔融即以佛法喻之，其〈為百官賀千葉瑞蓮表〉云：

臣等謹按《華嚴經》云：「蓮花世界是盧舍那佛成道之國，一蓮花有百億國。」《無量清淨經》云：「無量清淨佛七寶池中生蓮花上。」夫蓮花者，出塵離染，清淨無瑕，有以見如來之心，有以察如來之法；道之行也，曾不徒然！

引證佛經，以蓮花為佛祖之祥瑞之兆，「非學之貺，曠古未聞。殊特之珍，歷代一見。」武后之適逢唐世，如同蓮花之再現，使天下太平，四海安泰：

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現此妙身，當茲巨瑞，符契冥合，影響不差。有百億國，無量清淨者，天意若曰：護蘇蟻結，默啜蜂飛，聞鼓鞞而革面，望旌旗而懸首，指揮而邊境獲安，高枕而中國無事。風行電掃，納噍類於百億之區；霧廓塵銷。反游魂於清淨之域：深仁所及，不亦宏哉！⁴⁵

類似的還有〈代家奉御賀明堂成表〉云：「伏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陛下興復舊邦，光啟新邑，萬物睹而聖人作，百寶用而神靈滋，遠肅邇安，功成道洽。」⁴⁶踵事增華，極盡誇飾，為武氏革命喝采揚威。崔融善於對武氏加諸自身的光鮮頭銜尊號予以闡釋。〈代宰相上尊號表〉緊緊圍繞「至神」、「至聖」展開，強調「陰陽不測之謂神，應變不窮之謂聖，洋洋乎發育萬物，蕩蕩乎人無能名，尊號之來，豈徒然而已也？」⁴⁷還可看〈賀秦州河清表〉對於「神聖文武」的詮釋：

至若削平宇宙，混一華夷，乃武也；政教會昌，樂新禮創，乃文也；穆岩廊以凝睇，調風雨於絕垠，乃聖也；運挺埴以裁成，動陰陽而不測，乃神也；體茲四霽，侔彼兩儀，神物之來，蓋惟常理。⁴⁸

語辭典重華美，乃是初唐「大手筆」文字的範型。

與李嶠相類，崔融代人捉刀的文字亦超過半數，代宰相、皇太子、代百官、代地方官等等。崔融曾為太子侍讀，代時為太子的中宗撰寫各種表疏，現留存15篇，大體可分為三類，

⁴⁵ 同上註，卷218，冊3，2207。

⁴⁶ 同上註，2208。

⁴⁷ 同上註，卷217，冊3，2193。

⁴⁸ 同上註，卷218，冊3，2206。

一為日常起居事務表，如〈代皇太子請停幸東都表〉、〈代皇太子上食表〉、〈代皇太子請復膳表〉及〈代皇太子請起居表〉；二為賀祥瑞表，〈為皇太子賀甘露表〉、〈代皇太子賀白龍見表〉、〈代皇太子賀嘉麥表〉、〈為皇太子賀瑞木表〉、〈代皇太子賀芝草表〉、〈代皇太子賀石龜負圖表〉及〈代皇太子賀天后芝草表〉等；三為參與政務表，如〈代皇太子請修書表〉、〈代皇太子請放罪囚表〉、〈代皇太子請家令寺地給貧人表〉及〈代皇太子請給庶人衣服表〉等。

崔融形式上常以「臣聞」，「臣又聞」等辭彙，引經據典成文，表明其博聞廣記，在他的文章中處處可見典故，如〈為宗監請停政事表〉：

伏乞陛下察匹夫之志，思仲父之言，坦至公之方，宏滅私之道；羊叔子之辭開府，臣事君以忠；庾元規之讓中書，君使臣以禮。博求於眾，廣聽於人，停臣檢校夏官，輟臣平章政事，臣得避位清切，待罪上方，罄竭單誠，庶幾或濟。伏惟陛下容納纖陋，鑒揆愚蒙，使周勃無浹背之慚，虞邱有退身之地，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⁴⁹

（二）崔融擅長使用「連珠體」式的排比句，如〈代宰相上尊號表〉一文連續出現「其至公有如此者」、「其沖讓有如此者」及「其製作有如此者」；「人君之美色也」、「人君之甘旨也」、「人君之驕也」及「人君之麗也」。崔融的應用文創作華婉高麗，虔誠地表達了他本人及朝臣對武后本人歌頌的普遍願望，文辭更華麗，更工於修飾，強調構思與布局，即便是代人捉刀的文字，亦重視感情色彩的流露，更有文學性。如〈為溫給事請致仕歸侍表〉能夠以情動人，以理服人。

崔融的句式更加靈活，除常用的四、六、七等句式外，尤喜愛「三字句」間插句中，富於變化，如「雍雍如，欣欣如」、「草章程，垂勸誡」、「崇七廟，廣三雍」、「訓甲兵，誓將帥」、「定都邑，殊徽號」、「日月光，風雨潤，慶雲出，神泉湧」、「明至德，表至功」及「秩群望，情百神」。〈為朝集使於思言等請封中嶽表〉之「刻玉篆，印金泥」、「致太平，必封禪」、「崇徽號，定都邑」、「建三朝，崇五塋」、「三階平，萬方晏」、「慶雲出，神池湧，先宗擾，羽族馴」及「載巍巍，扇翼翼」；〈代皇太子賀白龍見表〉之「風雨順，陰陽和，五穀登，百寶用」；〈代百官賀明堂成上禮表〉之「穆穆焉，禺禺焉」；〈代家奉御賀明堂成表〉之「發大教，陳盛容，會百神，朝萬國」等。

三、祥瑞觀念在李嶠、崔融的頌體表文中的體現

李嶠、崔融的頌體表文中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祥瑞觀念的大量體現，反映出時代的媚

⁴⁹同上註，卷219，冊3，2211。

上取向。這種頌諛之文都是為武后的登基作輿論準備，或登基後的統治作揄揚頌歌，看待它們要結合當時誅殺流放的恐怖統治的背景。《唐會要·祥瑞上》云：

諸祥瑞若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大瑞者，即隨表奏。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處，不得苟陳虛飾。告廟頒下後，百官表賀，其諸瑞並申所司，元日以聞。其鳥獸之類，有生獲者，放之山野，余送太常。若不可獲，及木連理之類，有生即具圖書上進。⁵⁰

由此可知，凡有祥瑞之物，均要表奏，百官稱賀，自然「大手筆」作家要代為捉刀，甚至於鳥獸等平常之物也要上奏。

符瑞觀念本是漢代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念和漢代讖緯之學形成的一種天意徵兆，應用於皇權政治中則是一種天意測評。唐初君主是不重祥瑞的，貞觀2年，太宗云：

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⁵¹

第二天即下〈諸符瑞申所司詔〉。他曾嘲笑隋煬帝好聞祥瑞，對祥瑞之事始終保持清醒認識：「朕觀古之帝王，睹妖災則懼而修德者，福自至；見祥瑞則逸而行惡者，禍必臻。今瑞應之來，朕當勞心勞力，以答天地耳，何煩致賀」，⁵²修德以求福，高宗繼位初，保持著太宗時對災異祥瑞態度，令百官不得妄加稱賀。

然而，從顯慶5年（660年）以後，高宗患風疾，目不能視，朝中大事多由武后辦理。武后掌政後，唐代進入崇尚祥瑞的興盛期，則天在大興冤獄的同時，利用天命祥瑞之說證明自己稱帝的合理性，於是各地爭獻符瑞，一時呈泛濫景象。⁵³武后45年（660～704年）執政期內改元二十九次，許多的改元均與祥瑞有關，如顯慶6年2月，以曾、綿等州皆言龍見，遂改元「龍朔」；龍朔3年12月因絳州麟見，次年正月1日乃改元為「麟德」；上元3年11月1日陳州奏有鳳凰集，同月3日乃改元為「儀鳳」等。虛美文字應運而生，歌頌盛讚虛誇的訓練，是唐代前期每一個文人的必修課。⁵⁴祥瑞崇拜可以說是武后時期的社會風氣和政治需求，而

⁵⁰【宋】王溥：〈祥瑞上〉，《唐會要》（北京市：中華書局，1955），卷28，冊上，531。

⁵¹【宋】司馬光，【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市：中華書局，1956），卷193，冊13，6056。

⁵²此為貞觀18年10月，山南獻木連理，長孫無忌等人率百官拜賀，太宗答語。

⁵³參見李申。《隋唐三教哲學》（成都市：巴蜀書社，2007），55-68，關於唐初的「天命祥瑞崇拜及災祥之爭」的論述。

⁵⁴《文鏡秘府論》北卷專門有「敘瑞物感致」一類內容，列舉了各種禎祥符瑞之物，涵蓋了天地山川所

崔融、李嶠的大量賀表文充分說明這一點。崔融有〈為皇太子賀甘露表〉、〈代皇太子賀白龍見表〉、〈為皇太子賀佳麥表〉、〈為皇太子賀瑞木表〉、〈代皇太子賀芝草表〉、〈代皇太子賀石龜負圖表〉、〈代皇太子賀天后芝草表〉、〈代百官賀雨請復膳表〉、〈為西京賀斷獄甘露降表〉、〈賀泰州河清表〉、〈為涇州李刺史賀慶山表〉、〈為百官賀千葉瑞蓮表〉及〈為魏州成使君賀白狼表〉等。舉〈為涇州李刺史賀慶雲見表〉為例：

臣聞諸《瑞應圖》曰：「天下太平，則慶雲見。天子大孝，則慶雲見。」伏惟皇帝陛下早朝宴坐，憂勞庶政，遠無不肅，邇無不懷，神感潛通，至誠上格。涼秋中月，滯雨移旬，天心合而喜氣騰，陽德動而愁陰歇。文章鬱鬱，惠日照而成彩；花萼蓬蓬，晴風搖而不散。雖復紫雲來漢皇殿，白雲入殷帝房，校其優劣，疇以為喻。臣運奉休明，榮沾刺舉，千年多幸，已逢河水之清；百辟相歡，重偶叢雲之曲。不任悚躍之至，謹遣某官奉表稱慶以聞。⁵⁵

盡顯詞臣面貌，雖無實用，但足以全身保命。

李嶠有〈為百僚賀雪表〉、〈為武攸暨賀雪表〉、〈為納言姚璿等賀雪表〉、〈為百僚賀日抱戴慶雲見表〉、〈為百僚賀慶雲見表〉、〈為納言姚璿等賀瑞桃表〉、〈為百僚賀瑞筍表〉、〈為納言璿等賀瑞石龜表〉、〈為納言璿等賀瑞石表〉、〈為百僚賀瑞石表〉、〈賀天尊瑞石及雨表〉及〈賀麟跡表〉等。

當時賀表成為一種風氣，凡是朝廷軍國大事，均有賀表，崔融〈為韋右相賀平賊表〉，李嶠〈為納言姚璿賀契丹表〉、〈為雍州父老賀鑾駕停幸洛邑表〉、〈為賀舍人賀御書雜文表〉、〈為秋官員外郎李敬仁賀聖躬新牙更生表〉、〈為武承嗣等賀賊平後新殿成上禮食表〉及〈為百僚賀恩製錶〉等。與此相伴的是大赦、上尊號、大酺等，普天同慶，造成盛世的和諧景象，虛美頌德的富麗表章即在這種背景下產生，而李、崔無疑也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李嶠〈代百僚請立周七廟表〉、〈為朝集使等上尊號表〉、〈為杭州崔使君賀加尊號表〉及〈為韋右相賀拜洛表〉（另有〈奉和拜洛應制〉詩），崔融有〈代宰相上尊號表〉、〈代百官請上尊號第二表〉、〈進洛圖頌表〉等。

李嶠另有多達42篇「制」類文字（崔融只存有一篇），多以四六句式為主，仍難脫六朝遺跡，末尾一般以「可依前件，主者施行」結，不過程式套用而已。李嶠使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無任忝竊慚懼屏營之至」這樣的辭彙很頻繁，崔融亦反覆使用諸如「惴惴無任悚躍之至」的辭彙，相較而言，較為實在，直切所奏，謙辭較少。

有的物類，這些均是文人們熟記的典故知識和雅頌辭藻。參見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593。

⁵⁵【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18，冊3，2203-2204。

總體來說，李嶠及崔融的頌體表文或屬於禮節性公文，每逢皇帝生日或重大節日，品級較高的官員都要上表祝賀，他們代為捉刀，或屬於謙詞雅語，文采斐然華美，但其實沒有什麼實質性內容，形式千篇一律，格式化意味濃重。傅璇琮指出：則天時期「騰揚起一片虛假頌諛之聲」，「時間約為50年，比開元、天寶時期還多了好幾年，比韓愈、柳宗元、白居易等活躍的貞元、元和時期多了15年，而其文學的含金量卻稀薄得多」。⁵⁶觀李嶠與崔融的頌體表文即可見一斑，這些文字均是誅殺、貶逐、流放的恐怖環境下創作出來的，亦可窺見政治對文學的影響力。事實上，當時多數文人均寫頌體以迎合時世，甚至是文壇下層人士的代表陳子昂亦有〈大周受命頌〉（即〈神觀頌〉四章）、〈慶雲章〉，王勃亦有〈拜南郊頌〉、〈九成宮頌〉、〈乾元殿頌〉等頌美文字。

肆、「才章富健」的功德碑與「用思精苦」的哀冊文

一、〈大周降禪碑〉與〈嵩山啟母廟碑〉

封禪是古代帝王祭祀的最高禮，史稱「封禪，所以告成功，祀事無重於此」（《舊唐書》），它是中國特有的敬天思想的產物。唐以前，歷史上只有秦皇漢武國勢極盛之時舉行過封禪大典，唐太宗生前曾兩度議封禪，但均因天災、戰爭等原因未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武后天冊萬歲2年（696年，即萬歲通天元年）先後進行了兩次封禪，高宗封禪泰山，則天封禪嵩山。伴隨著封禪大典，常會有大量的賦頌賀表。

〈大周降禪碑〉是李嶠頌揚武后的巔峰之作，與武后本人之〈大周昇中述志碑〉、武三思之〈大周封祀壇碑〉並為則天嵩山封禪之翹楚，且為三篇之魁首。武后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位正式封禪中嶽的帝王，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獨領風騷。李嶠參與了則天封禪嵩山的全過程，並以極大的熱情記錄了此次封禪禮儀，積極地為則天踐祚帝位造勢、尋找法理。〈大周降禪碑〉與則天本人親撰的〈大周升中述志碑〉並立於嵩山之巔，分立於西南、東南兩側，今天則天碑文已佚，惟有李嶠碑文獨存。當時「三靈聳聽，萬方翹首」，⁵⁷李嶠以其淩雲健筆記載了武后嵩山封禪之盛況。文中開篇即言「變化莫神於開闢，崇高莫大於富貴」，強調則天開闢之功，富貴之身，值此「上下同德，幽明合契」之時，需名臣良史以記其事，「大手筆」李嶠當仁不讓。其在文中大肆宣揚武周革命的合理性：「我大周之有天下也，鼓道德之林藪，恢聖神之事業，始於閭闔，成於家邦，輝光燭於兩朝，德

⁵⁶傅璇琮。〈武則天與初唐文學〉，載於《唐宋文史論叢及其他》，傅璇琮（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4），216。

⁵⁷【唐】武三思：〈大周封祀壇碑〉，載於《全唐文》，【清】董誥等（北京市：中華書局，1973），卷239，冊3，2417。

澤流於八裔。」將則天與虞舜大禹相比，稱頌其「鼎新革故」、「改物承天」之功「千帝所不能及，六籍所不能談」，武周與周武滅商、曹魏代漢一樣是新王朝的建立。文中稱則天「屈己為登女皇之位」，極盡阿諛溢美之能事，連續用「此之謂神力」、「此之謂天造」、「此之謂建國」、「此之謂立政」、「此之謂禮法」、「此之謂文教」、「此之謂武德」、「此之謂孝理」及「此之謂沖挹」九組排比句稱揚則天帝業，列舉則天銳意改革、制定禮樂、發展教育、勸課農桑等革新措施。李嶠稱頌當時「野無遺賢，朝無闕典」，這與51年後（天寶六載）李林甫上表賀玄宗時的虛假繁榮如出一轍，真是「升平之浹洽也如彼，符命之昭彰也若此」。則天受命登基，乃天降符瑞，「欽承元命，對越上元，廓天地之宏圖，張祖宗之丕業。臣妾四極，驅馭百靈，鼓舞發育，經緯彌綸之績宣，滲漉沉潛，懷柔容保之恩備」，「恩澤流通，教化洽著」，故九州萬國同賀。碑文的後半敘述封禪的過程，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李嶠認為：「秦嬴極暴，企踵於無為之朝；漢徹窮奢，厚顏於盛德之事：人不見義，其來自久」，秦皇漢武封禪泰山被視為不義，甚至對傳統堯舜至黃帝用事泰山梁甫也提出挑戰，結尾的頌文云：「知崇高之可封，悟梁甫之虛躡」，⁵⁸藐視泰山，突出嵩山，用李嶠自己的話說此次封禪「煒煒煌煌」、「巍巍蕩蕩」，真可謂震天撼地，摧枯拉朽。〈大周降禪碑〉是高宗武后「采儒術，徵禮官」後所進行的各項禮樂活動的最高峰，也是為武周革命營造盛世氛圍的理論產物，其中的虛誇過譽之辭，一味地逢迎女皇，實在是御用詞人的諂媚嘴臉，雖辭藻華瞻，才華橫溢，亦難免讀之令人生厭。

在則天封禪嵩山之前，崔融撰〈嵩山啟母廟碑〉，《舊唐書·崔融傳》曰：「聖曆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啟母廟碑〉，深加歎美。」⁵⁹這是真正使崔融名聲大噪的作品，他因此文而被則天發現重用，迅速提升為著作佐郎。武周革命，則天以女性稱帝，本是「牝雞司晨」，禮法不容，如此的反傳統本來是非常不容易從女性的角度加以歌頌的。啟母是傳說中夏啟的母親，大禹的妻子塗山氏，崔融巧妙地透過讚美塗山氏來頌揚則天。文中云：

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元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總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為人極也；潔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項氏之所以為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

⁵⁸ 此段皆參見【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48，冊3，2505-2508。

⁵⁹ 【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94，冊9，2996。

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為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踰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彰后功也。

《唐宋文舉要》乙編選入該文，碑文歷敘鬼神變化之道，證啟母異文，辨陽翟婦人之說，舉古代聖母奇跡證啟母化石之說非誣，說其神異，頌唐功德，修葺既成，像設供張，仙靈會集。觀其「氣為母則群物以萌，月為母則容光必照，坤為母則上下交泰，后為母則邦家有成」，歷代歌頌母者不過如此，則天以母后而為天子，當然「深加嘆美」這樣的文字。文末有騷體：「壽宮愴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幃，白羽扇兮青絲履。」、「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回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⁶⁰洋洋灑灑，一瀉千里之氣勢，淵博厚重之學識得以彰顯。《金石錄》卷24跋尾有云：

按《淮南子》云：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其說可謂怪矣。然漢武帝幸緱氏至中嶽，見夏後啟母石，列於詔書，則固已信之矣。其後郭璞注《山海經》，顏師古注《漢書》，皆具載其語，而融又文其事於碑，流俗安得不惑乎？⁶¹

二、〈攀龍台碑〉與〈則天大聖皇后哀冊文〉

（一）「天下第一碑」：〈攀龍台碑〉。〈攀龍台碑〉又稱〈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帝碑〉，是則天為乃父立的功德碑，被譽為「天下第一碑」，據《永樂大典》卷5203記載：碑高5丈、寬9尺、厚3尺，〈攀龍台碑〉是李嶠集中第一長文，共約6700餘字，是碑文中的長篇巨著。前人評其「錯綜震盪，才章富健，斯則集中之勝」，⁶²所言非虛。李嶠的碑文記載了武氏家族的起源和籍貫，詳細記述了武士護一生的經歷，對武氏極盡褒譽。碑文是則天皇帝親自審定的，文中所勾勒的武士護的生平仕宦、對於武后的出生地考證提供了最早的（雖然並非是純粹客觀）的史料。李嶠是武周革命建國理論的有力鼓吹者，在〈代百僚請立周七廟表〉即力申聖神皇帝遙繼姬周之說，聲言「后稷以弼諧大舜，隆姬錫受命之符；太皇以翼亮有唐，聖武當樂推之運。……神靈扶更始之運，億兆慶維新之業」，⁶³追尊周文王和平王少子，使之納入七廟。聖神皇帝之父早已有帝王之象。〈大周降禪碑〉稱：

⁶⁰ 以上所引崔文皆參見【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20，冊3，2220-2223。

⁶¹ 參見《四部叢刊續編》景舊抄本，載於《中華基本古籍資料庫》（網路資料），161。

⁶²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京市：中華書局，1993），冊上，278。

⁶³ 【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43，冊3，2453。

太祖無上孝明高帝含幾察道，盡睿窮神，屈帝象而龍潛，座台庭而虎變。黃星造魏，而文握漢圖；赤羽興姬，而武遷商鼎。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遂荒三極，奄有萬方，御六辯而高馳，憑九霄而下濟。

太祖無上孝明皇帝（則天追封其父武士護）是「屈帝象而龍潛」，助唐起事，至聖神皇帝則應命而生，更始維新，代唐立周。如果說〈大周降禪碑〉吹噓則天的帝業還有些事實依據的話，那麼〈攀龍台碑〉對武士護的諛辭則近乎於妖魔鬼怪，純出於臆想，與其說是傳記，不如說是小說，多為杜撰。我們將此碑作為李嶠的碑文中的傳奇因素予以介紹。⁶⁴碑文開首即云：

乃提六合之樞紐，扣二儀之鐻鑰，日月既出，方利見於通三；風雲未和，尚勞謙說初九。蓄宏圖於緣鶴之邸，垂慶緒於斷鼇之運，屈伸應物而無累於時，進退隨方而不違於道；非聖人之睿智，其孰能與於此乎？

描述其誕生時，頗類六朝志怪筆法：

母文穆皇后，嘗祈晉祠於水濱，得文石一枚，大如燕卵，上有紫文，成日月兩字，異而吞之，其夕夢日入寢門，光耀滿室，已而懷孕，遂產帝焉。及載誕之宵，夢人稱唐叔虞者謂後曰：「余受命於帝，保護聖子。」驚寤而帝已生。明日，紫氣氛氲，覆冒其城上，俄而化為五色，仿佛若文繡之衣，左右親賓，莫不駭異。

形容其容貌：「乃龍顏武肩，有含良之骨法，戴鈴懷鬥，似高密之容狀」，形容其聲望：「帝高名宿望，傾動當朝，承風仰流，揖拜無地，衣冠如宗海之赴，士庶均在田之觀」，形容其風度：「帝風儀偉麗，占對詳明，朝端改容，左右屬目」，由於武氏生之異於常人，出生即有帝王之像，形貌威儀出眾，才兼文武，人品、學識、才幹均是名動當世，當時名流皆「虛心降節，投分申交」，但亦不免遭為猜忌，忌賢妨能的楊素幾生殺念：「吾觀武氏風骨，實有英雄之度，今太平無事，安用此人？不如除之。」李嶠巧妙比擬武氏之遭忌如「漢高以英威冠代，取忌范增，劉主以偶儻，見疑曹操」。接下來，描述煬帝大業7年徵高麗，武氏進諫：「夷狄不賓，肇於上古，自當置之度外耳，未有紆萬乘而讎小忿，擾群生而赴非急。夫兵猶火也。不戢自焚，禍亂之萌，從此始矣。」略陳「古今兵要」，後來「卒擒

⁶⁴筆者參加2012年5月18～21日於逢甲大學舉辦的「氣候·環境與文明——第十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指出20年前臺灣《食貨》雜誌曾有系列論文從歷史角度對〈攀龍台碑〉展開討論，謹此致謝，惜暫未得以查詢補正本文之論述。筆者此處僅以文學角度對這一碑文展開論述，希或有新意。

元感，帝之力焉」。同樣出於「後主猜忌」，不願多取功名，誠如「無忌之克敵讓封，仲連之立功辭位」。大業12年，煬帝再幸江都，武氏預言「此行也，不復還矣」，後又預言「（李）密雖有才氣，未能經遠，欲圖功業，終恐無成」，而稱唐高祖「雄杰簡易，聰明神武」，遂投刺往謁，並被高祖稱為「周文之得姜牙」，「成湯之逢伊尹」，並立下無上勳業，「決機於龍門之日，定策於狐疑之辰，笑裨諶之請車，同子房之借箸：實建王業，事符天啟。」凡此種種如神仙道士般的神異。碑文詳述武氏與高祖過從甚密，高祖因有武氏的匡輔才能「頹綱所以克振，令典於是畢修」，故而賞賜非常，並插入高祖的一段言辭以示尊寵：「朕在並州之日，恒往卿家，今欲使卿一門三公，用微答主人之意也。」、「爾後高祖行幸，常令帝總留台事，兼知南北牙兵馬判六曹尚書。相國之處秦中，蓋資鎮撫；令君之住許下，仍參籌畫；具瞻惟允，是謂國鈞。」「高祖親為求偶」，娶隋納言遂甯公楊達女為妻，並「自為帝婚王」，李嶠編造這樣一個謊言意在抬高則天的身世地位。碑文稱太宗為儲君時依然對武士獲「寵賜頻繁，事以殊禮」，直至高祖駕崩後，武氏「舉聲大哭，嘔血而崩」，真是「敬想忠義之風，緬惟臣主之分，求諸古昔，未之聞也」。⁶⁵在碑文的最後，李嶠一連串用八個「斯乃」句式將武氏比作「風皇」（指伏羲氏）、「火帝」（指燧人氏）、「軒後」（指軒轅氏）、「嫫水」（代指舜）、「夏王」（指禹）、「商後」（指商湯）、「周公」（指周文王）、「孔宣父」（指孔子）等幾乎所有古代大德大賢之君主，在頌文中再次不厭其煩，不吝辭藻的用15首頌詞反復咏贊武氏一生以作結。

（二）思苦神竭的武后哀冊。崔融對武后充滿感激之情，故武后死後，曾深情寫下〈則天皇后挽歌〉兩首以寄託哀思。後因撰寫〈則天大聖皇后哀冊文〉，發病而卒，一方面說明其用思精苦，一方面說明他對武后的仰慕之情。這是一篇典型的駢體頌文，堪稱諸「大手筆」作家中哀冊文之翹楚，將駢文的功效發揮到了極至，雖不足千字（990字），卻耗盡了崔融所有的才華與心思，真可謂是字字千金，難怪後世「以為三二百年來無此文」。⁶⁶冊文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講明史臣撰文之原因，即「揚言聖德」；第二部分是文章的重點，崔融以六十四句駢四鴻文，將武后嗣位與唐世，對其功績允當而又精煉的歌頌；第三部分，三次「嗚呼哀哉」，雖是冊文中之習語，但能體會到作者的哀傷與淒絕，讀來令人動容。如寫到武后的駕崩云：「出國門兮林邱，覽舊跡兮新憂。具物森兮如在，良辰闕兮莫留。當赫曦之盛夏，宛蕭瑟之窮秋。山隱隱兮崩裂，水洄洄兮逆流。嗚呼哀哉！」⁶⁷崔融的冊文及其挽歌雖是歌功頌德，但不乏真情實感，如實地概括了則天的千秋功業、無奈的抉擇及最終圓滿的結局。稱此文為千古第一冊文，並不為過。

⁶⁵ 此段皆參見【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49，冊3，2515-2523。

⁶⁶ 【唐】劉餗：《隋唐嘉話》，《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下，110。

⁶⁷ 【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20，冊3，2226。

伍、綺靡頌歌之外：李嶠、崔融的實事奏議

武后時代，許多文人的創作均是頌體與諫議之複合體，李嶠、崔融即是如此，《舊唐書》李嶠、崔融的傳記都記載了二人的諫書。當然，與陳子昂等切諫直言相比，崔、李的奏議文顯得較為溫和，但畢竟在潤色鴻業、誇張潤飾的主色調外，增添了一種實在與亮色。以下分別述之。

一、李嶠的別樣面目

前人批評李嶠文章趨時應制，不復直言極諫，而走向媚附權幸，這種觀點雖從總體上不錯，但亦不可一概而論。史載李嶠於來俊臣構陷狄仁傑等人時申辯冤狀，「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乃與（張）德裕等列其枉狀」，⁶⁸從而忤旨被貶。由此可以看出其品格中的另一面。誠如李嶠自己所言，諷喻諫疏是「臣子之舊經，國家之前式」（〈自敘表〉），他的確寫過一些拾遺補缺的文字。如〈論巡察風俗疏〉載於史傳，提出「禁綱尚疏，法令宜簡」，可謂切中時弊，強調加強巡察御史의職能和行使權力的範圍：

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閒，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奸訛，觀采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⁶⁹

文字質樸無華，用語平和，全用散體，武后閱覽此疏後稱善，欲擇使巡察，只是因為有人沮議而未能施行。李嶠一生節儉，反對鋪張，這實際與武后之崇尚鋪張誇飾的風格不類，久視元年所撰〈諫建白馬阪大象疏〉亦載於史書：

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眾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眾，亦有傭力客作，以濟饑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

⁶⁸【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94，冊9，2992。

⁶⁹【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47，冊3，2496。

慈悲之心，沾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⁷⁰

針對則天佞佛，主張廣濟貧窮，當然不能得到武后的採納，但其精神仍是值得稱道的。〈請輟近侍典大州疏〉之針對當世「重內官輕外職」的弊端：

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望於台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務在憂國濟人，庶當有所補益。⁷¹

此文為李嶠、唐休璟等人共同疏奏，文中建言放內官於外任，用語簡明剴切。後來玄宗時張九齡亦建議玄宗重視地方官人選，糾正重內官輕外的風氣，玄宗採取京官和地方官交流任用制度，使出入常均，為了表示重視地方官的典選，玄宗有一次親自殿試新授縣令，將四十多名考試成績低的人放還。李嶠這些均是主張對於現行行政官員體制改革的奏議文章，富於現實意義。

李嶠在中宗時奏置員外官數千員，導致官僚倍多，府庫減耗，故引咎辭職，「並陳利害十餘事」，以宰相之尊，自陳失政，對中宗朝問題多所涉及，這就是著名的〈上中宗書〉。總體上除第一條是勸諫中宗「微服潛遊」以外，基本上是從財政角度針對中宗朝的爵賞過濫與生活奢費造成府庫的空虛而發，主張裁汰老病與員外官員，⁷²停止對夷族京官的俸祿、寺觀建設，避免出家入道以避賦役、賄賂貴戚「移沒籍產」，進行「訪察括舉」，放還閒散等方式進行改革，大概是李嶠篤定引咎辭職，故語辭頗為激切，直擊要害，暢言時政之失，無所顧忌，陳事簡潔明快，與表類文章判若二人。此堪比著名的姚崇對玄宗的「十事要說」，只不過主上有昏明之別，臣子有賢愚之分，中宗雖「手制慰諭」不予李嶠辭官，李嶠繼續做著中書令，弊政依舊存在，君臣依舊無所作為。

按照劉勰的說法，表是用來陳述表情的，所謂「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雖然章表是典型的公文體，但在功利目的下動之以情是其文體要求。上述對武后及王公大臣吹捧稱讚的表文不能說完全出於矯情，但很難說是在表達真情實感。然而，表體多包，還有一些表文反映了李嶠的另一面。如〈為水潦災異陳情表〉之指陳時弊：「衡鏡

⁷⁰同上註，2497。

⁷¹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卷26，冊上，327題為〈選賢為州縣官奏〉（題擬，164字）。按：此文收於【後晉】劉昫等（主編）：《韋嗣立傳》，《舊唐書》，卷88，86，但並非全為韋嗣立之語，參見張衡東。〈唐代官員不願外任刺史原因新探〉，《江漢論壇》，3期（2009），86，即將此語安在了韋嗣立的頭上。又，此文較《全唐文》卷247李嶠〈請輟近侍典大州疏〉多87字，實為一文。

⁷²李嶠另有〈請減員外官疏〉主張裁冗官員。

失序，紀綱不張，官僚日增，府庫歲減：謬職之謗，或譏於畫武續貂；敗官之尤，有議於誼盧吠鵲。」⁷³「當今兵戎未靜，費務方多，人庶空虛，官僚苟且，不可不深為防慮，妙思政術。」⁷³〈請令御史檢校戶口表〉則是針對括戶這一社會問題展開的討論。則天執政後為收買人心，厚賞無度，增設機構官職，官僚體系迅速膨脹，加上連年的對外戰爭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財政負擔嚴重，造成「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違背軍鎮，或因緣逐糧。苟免歲時，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積歲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掛，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竭，闕於恒賦，亦自誘動愚俗，堪為禍患，不可不深慮也。」逃戶問題相當嚴重，所以他認為「宜令御史督察簡校，設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以御之，為制限以一之：然後逃亡可還，浮寓可絕。」⁷⁴李嶠可稱是唐代主張實行括戶的第一人，對以後玄宗時期宇文融等實行該政策有一定的影響。

二、崔融的疏議

《文心雕龍·奏啟》：「自漢以來，奏天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疏，即疏通事理，條布言辭之意，上書陳言時為了達到君王的屬意與嘉納，需要文采和事理兼善，需要遠見卓識，也需要直言敢諫的勇氣，中國古代許多政治家均以善疏奏聞名，崔融在這一方面表現得相當突出。眾所周知，崔融因攀附張氏兄弟而為人詬病，史稱「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之士，融與李嶠、蘇味道、麟台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⁷⁵但史書亦載：「崔融、盧藏用、徐彥伯等，文學之功，不讓蘇李，……規諫之深，崔比盧、徐，稍為優矣。」⁷⁶可見對於文人的評價不可偏信某一種說法。前人對崔融的諫疏文章殊少重視，然細讀其僅存幾篇文字，繼承了初唐魏徵等人的諷諫傳統，頗為可讀。

〈諫稅關市疏〉是一篇精彩的文字，《舊唐書》本傳全載，並得到武后的採納。文中歷陳往古之時，中代已來，排比句式，細論關市稅之六不可，後人稱「陳六不可，利害深切」。⁷⁷引用易系、班固、蕭何、老子、孟軻、史籍、文子、古人有言等。邏輯嚴密，敘理有序，運用頂針手法，環環相扣，筆勢雄渾。試舉一段：「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御？」⁷⁸前人評此文「毋擾是此篇大義，文則陸離璀璨，色澤彌古。」⁷⁹〈拔四鎮議〉可稱是一篇西域史。首先歷述「四鎮」名稱之演變，稱「北狄之為中國患者久哉」，從唐虞之獯

⁷³【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46，冊3，2494。

⁷⁴同上註，卷246，冊3，2487。

⁷⁵【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崔融傳》，卷114，冊13，4196。

⁷⁶【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94，冊9，3007。

⁷⁷【清】陳鴻墀：《習學記言》，《全唐文紀事·論列》（北京市：中華書局，1959），卷22，277。

⁷⁸【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19，冊3，2213。

⁷⁹【清】陳鴻墀：《全唐文紀事》，卷首，9。

鸞，殷周之獫狁，漢代之匈奴、冒頓、烏丸、鮮卑，至「拓跋世則蠕蠕倡狂，宇文朝則突厥恣睢」，「名號因時而改，種落與運而遷，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連禍結，無代不有，長策遠算，曠古莫聞。」接著敘述北狄在西漢、王莽、漢光武帝、唐太宗時的歷史及與中原的離合，直至唐高宗時王教傑始復四鎮，崔融論之：

今若拔之，是棄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賊，前事者後事之師，柰何不圖也？四鎮無守，則狂胡益贍，必兵加西域，諸蕃氣羸，恐不能當長蛇之口。西域既動，自然威臨南羌，南羌樂禍，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連，則河西危，河西危，則不得救。況復邊境守御之具未整，內郡武衛之備未精，方須命將出師，興役動眾，向之所得，今之所失，向之所勞，今之所逸，可不謂然乎？而議者但憂其勞費，念其遠征，曾不知其蹙國減土，春秋所譏，杜漸防萌，安危之計。⁸⁰

後來郭震（元振）有〈論去四鎮兵疏〉，⁸¹「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內患者甘、涼、瓜、肅是。」「夫善為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今議事者，舍近患而靡恤，務遠患而是貪，臣愚駑，罔識厥策。」明·賀泰輯《唐文鑒》卷之4選〈拔四鎮議〉為中宗朝諫言之楷範。崔融行文擅以氣運筆，如「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吏部兵部選人議〉），大氣磅礴，氣勢恢宏。

「有唐一代，律詩與古文之體，度越前代，而皆發於武后時，可謂彬彬焉」。⁸²李嶠與崔融二人是初唐時期最負盛名的「大手筆」作家，皆以創作宮廷文學聞名，稍後於二者的文壇領袖張說曾給予大力褒揚，稱其「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⁸³李崔二人生逢同時，李嶠略長於崔融，且對之有提攜之恩，崔融〈報三原李少府書〉云：

僕少乏文章，長微學藝，緣情體物，誠所不工。周朽礪鉛，有時牽拙。……而吾子廣肆褒揚，深加提飾，上揆飛龍之奏，穿援儀鳳之音，語人必於其倫，在僕何可至此。

崔融稱李嶠「詞裁清雅，興旨奧深」，「超超美論，上陵於八十五篇，婉婉成章，下該於五十六字」，「德擅宗師，名推雄伯」。⁸⁴李嶠亦曾於〈授崔融著作郎制〉中稱讚崔融「詞

⁸⁰【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19，冊3，2215-2216。

⁸¹同上註，卷205，冊3，2075-2076。

⁸²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冊上，278-279。

⁸³【唐】劉肅，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文章》，卷8，130。按：受張說此譽者尚有薛稷及宋之問二人。

⁸⁴以上引文皆參見【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20，冊3，2219。

麗楊班，行高曾史」，「載筆西垣」，「紬文東觀」。⁸⁵他們無疑是武后一朝的文章魁首（沈宋之律詩還是富吳之古文，雖知名於時，但皆偏於一端），同處文章四友之列，政治地位顯赫，是當時的宮廷文壇領袖，均有大量頌揚武后之文辭留存，在創作上有一定的類似之處，均工表文，代人捉刀之文均超過其文章總數的一半，奏議、碑誌文字均有可稱道之處。縱觀二人現存的創作實際，崔融「文章獨步當時，莫出其右」，⁸⁶更勝一籌。

陸、結語「文章四友」之位次

「文章四友」之位次為崔、李、蘇、杜，應如何理解？首先，從唐人及史書中對於四人的文學評價來看，崔融是最負文名者。楊炯〈庭菊賦〉云：「崔融、徐彥伯、劉知柔、石抱忠以文章顯。」《舊唐書·張行成傳》：

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晉後身。……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為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⁸⁷

其詩技壓四方，可見其當時成就不容小覷。《舊唐書·王方慶傳》云：「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則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為榮。」⁸⁸一向狂傲的杜審言亦對其服膺，崔卒後為其服總麻孝，說明崔融當時的文名。張說〈祭崔侍郎文〉中稱讚崔融「位以行成，名以才起，……束帶立朝，惟國之俊，抑揚吐納，金聲玉振，器不滯方，神無留韻。」⁸⁹其為文華婉典麗，朝廷大手筆多出其手。〈崔司業挽歌二首〉其一亦贊云：「海岱英靈氣，膠庠禮樂資。風流滿天下，人物擅京師。疾起揚雄賦，魂遊謝客詩。從今好文主，遺恨不同時。」再來看新舊《唐書》本傳對崔融的評價。《舊唐書·崔融傳》云：「中宗在春宮，制融為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曆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啟母廟碑〉，深加歎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覲碑文。」、「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敕付融。」《新唐書·崔融傳》云：「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撰〈武后哀冊〉最高麗。」說明崔融其文章藝術得到當時及後世的肯定。

⁸⁵同上註，卷242，冊3，2448。

⁸⁶《實錄》，卷4，引自周勛初（主編）。《唐人軼事彙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上，439。

⁸⁷【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78，冊8，2706。

⁸⁸同上註，卷89，冊9，2890。

⁸⁹【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卷233，冊3，2358-2359。

李嶠次之。《舊唐書·李嶠傳》云：「則天深加接待，朝廷大手筆，皆特令嶠為之。」⁹⁰《新唐書·李嶠傳》云：「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李嶠年方26歲與前輩駱賓王等齊名於制科試中。「久乃召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⁹¹「文冊大號令」，自指文章而言。李嶠更是享譽當時詩壇，《本事詩》、《唐詩紀事》卷10等稱賞其〈汾陰行〉、〈侍宴桃花園咏桃花應制〉、〈奉和天樞成宴夷夏群僚應制〉等詩冠絕當時，其詩多次被引用或入選至《初學記》、《國秀集》、《詩式》當中，其百首咏物詩更對於當時的初盛唐律詩創作具有示範普及作用，這已得到前輩學者的注意，⁹²故不再贅述。

蘇味道與李嶠齊名，史書常以「蘇李」並稱，《舊唐書·蘇味道傳》云：「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教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為謝表，托於味道，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代。」⁹³可見其擅於代人捉刀，所寫表文自當屬現代文章範疇。《大唐新語·文章》：「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貴重齊飛日，……』。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⁹⁴又載其所寫〈正月十五夜〉詩盛傳於當代之事。《初學記》曾多次引用其詩。可見其詩文兼擅。雖則引其詩，「以文章著稱」恐非只指其詩。《舊唐書·職官志二》翰林院：「比以文詞召入待詔。……天后時，蘇味道、韋承慶，皆待詔禁中。」⁹⁵以「文詞」待詔禁中，應當指其文章成就也。

杜審言之詩歌受到文學史許多關注，其詩亦被當時《初學記》、《國秀集》、《詩式》等引用。《舊唐書·杜審言傳》云：「杜審言雅善五言，尤工書翰。」⁹⁶說明審言不但能言詩，亦工書信或文書。《新唐書·杜甫傳》云：「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⁹⁷此段乃是杜甫在其先後數次獻賦頌後所言，故而「以文章顯中宗時」之「文章」應該包括那些表現奉儒守官思想的文章。

其次，「文章四友」的排序與四人在當時宮廷中的地位與成就對應。他們均以文學詞臣的身分服務於朝廷，尤其是受到武后的拔擢而迅速由下層官吏一躍而為文學弄臣。崔、李二人文章成就較高，被冠之以「大手筆」的稱號，代表朝廷發布詔令文書，深受皇帝寵信，地位顯赫。《舊唐書》：

⁹⁰ 以上皆參見【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94，冊9，2993。

⁹¹ 【宋】歐陽修、李昉等（主編）：《新唐書》，卷123，冊14，4367。

⁹² 葛曉音。〈創作範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從李嶠《百咏》談起〉，載於《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葛曉音（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35-251。

⁹³ 【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94，冊9，2991。

⁹⁴ 【唐】劉肅、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卷8，124。

⁹⁵ 【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43，冊6，1853。

⁹⁶ 同上註，卷109上，冊15，4999。

⁹⁷ 【宋】歐陽修、李昉等（主編）：《新唐書》，卷201，冊18，5737。

史臣曰：……蘇味道、李嶠等，俱為輔相，各處穹崇。觀其章疏之能，非無奧贍；驗以弼諧之道，罔有貞純。故狄仁傑有言曰：「蘇、李足為文吏矣。」得非齷齪者乎！摸棱之病，尤足可譏。崔融、盧藏用、徐彥伯等，文學之功，不讓蘇、李，止有守常之道，而無應變之機。……贊曰：……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堪尚，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罔忒。⁹⁸

「文章四友」均曾以文才降節事張易之兄弟，⁹⁹受到後世譏薄。但正恰恰說明在當時的宮廷文人當中，四人能以其文章才學受到矚目。有趣的是，李嶠為當時文壇宿老，前後為相者三，是當之無愧的政壇與文壇雙重領袖，四人之中如果以詩歌而論，李嶠、杜審言的詩名與成就顯然要高於崔融，以年齡而論，崔融最小，可是在「文章四友」中李嶠位居崔融之後，故而由此可以推知這個排名當主要是依據四人的文章成就而言。李嶠、崔融之文如上文所述，以文章成就論，崔實較李更勝一籌，更精美更富於文學意味。至於蘇杜二人，文不傳世，位列三、四名，恐文章成就難與崔李比美。從歷史人物並稱時的聲調考察，平聲居前，仄聲列後乃為慣例，所以不難理解「崔李」、「蘇杜」。

其三，從四人的著述情況亦約略而觀。《新唐書·藝文志》錄《崔融集》60卷、《李嶠集》50卷、《蘇味道集》15卷及《杜審言集》10卷。¹⁰⁰以四人著述之數量而論，「世號崔、李、蘇、杜」的排序有一定道理，崔融年最小、壽最短，而著述不讓諸君，其次才是李嶠、蘇味道及杜審言。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文章四友」中的「文章」兼指詩賦與文章，且偏重於文，「崔、李、蘇、杜」的排序與其文章成就及在當時被認可的程度基本吻合。

誌謝

筆者謹此對匿名審查人的修改意見和建議深表謝忱。

⁹⁸【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卷94，冊9，3007。

⁹⁹分別見【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崔融傳》，卷94，冊9，3000：「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台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宋】歐陽修、李昉等（主編）：《新唐書·杜審言傳》，卷201，冊18，5736：「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峰州。」

¹⁰⁰《舊唐書·經籍志》崔融存文40卷，李嶠存文30卷，蘇味道存文15卷，杜審言存文10卷，排序亦是如此。

參考文獻

- 【漢】王充，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市：中華書局，1959）。
- 【漢】班固：《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62）。
- 【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2），卷52，90。
- 【唐】武三思：〈大周封祀壇碑〉，《全唐文》，【清】董誥等（北京市：中華書局，1973），卷239，冊3，2417。
- 【唐】張庭芳：〈故中書令鄭國公李嶠雜咏百二十首序〉，載於《全唐文》，【清】董誥等（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卷364，頁3693。
- 【唐】張說：〈昭容上官氏文集序〉，載於《全唐文》，【清】董誥等（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卷225，冊3，2275。
- 【唐】楊炯撰，徐明霞點校：《楊炯集》（北京市：中華書局，1980），卷3，36。
- 【唐】劉肅，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市：中華書局，1984）。
- 【唐】劉餗：《隋唐嘉話》，《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下，110。
-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3）。
- 【後晉】劉昫等（主編）：《舊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5）。
- 【宋】王欽若等（編纂）：《冊府元龜》（北京市：中華書局，1960）。
- 【宋】王溥：〈祥瑞上〉，《唐會要》（北京市：中華書局，1955），卷28，冊上，531。
- 【宋】司馬光，【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市：中華書局，1956）。
- 【宋】歐陽修、宋祁等（主編）：《新唐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75）。
- 【清】陳鴻墀：《全唐文紀事》，北京市：中華書局，1959。
- 【清】董誥等（主編）：《全唐文》（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
- 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593。
- 王啟興。〈初唐三詩人重出詩篇考辨〉，《武漢大學學報》，1期（1999），78-80。
- 曲景毅。〈「大手筆」作家與唐代儒學的三次復振〉，載於《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三十一輯（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171-187。
- 曲景毅。〈論李德裕的公文寫作〉，《國學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卷27，47-74。
- 曲景毅。〈試論中唐常袞制書之文章價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5期（2012），165-186。

曲景毅，〈唐代「大手筆」作家考論〉，《輔仁國文學報》，32期（2011），75-103。

吳鋼（主編）。〈大唐故中書令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戶部尚書汾陰男贈光祿大夫使持節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薛公（元超）墓誌銘並序〉，《全唐文補遺》第一輯（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4）。

李申。《隋唐三教哲學》（成都市：巴蜀書社，2007），55-68。

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北京市：東方出版社，1999），195。

周勛初（主編）。《唐人軼事彙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上，439。

高步瀛。《唐宋文舉要》乙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2，1419。

張衛東。〈唐代官員不願外任刺史原因新探〉，《江漢論壇》，3期（2009），86。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5），卷26，冊上，327。

傅璇琮。〈武則天與初唐文學〉，載於《唐宋文史論叢及其他》傅璇琮（鄭州市：大象出版社，2004）。

葛曉音。〈創作範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詩的普及—從李嶠《百詠》談起〉，載於《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葛曉音（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35-251。

葛曉音。〈論宮廷文人在初唐詩歌發展中的作用〉，載於《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葛曉音（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9-30。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京市：中華書局，1993），冊上，278。

New Perspectives on “Wenzhang Siyou:” A Focus on Li Qiao and Cui Rong’s Practical Prose

Jing-Yi Qu

Division of Chines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Abstract

Li Qiao (李嶠), Cui Rong (崔融), Su Weidao (蘇味道), and Du Shenyan (杜審言) are called “Wenzhang Siyou”(文章四友) or the Four Literary Friends in histor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on their achievements in prose writing has been done. This study focuses on Li Qiao and Cui Rong’s practical prose because Su Weidao’s and Du Shenyan’s prose was not reserved. In Li and Cui’s prose, beautiful and parallel styles worsen over time. Their ode declarations, merit epitaphs, and mourning appointments indicated their appointments as palace writers, and become continuation of the Six Dynasties. There were no political meanings or true feelings in their writing. Many auspicious ideas, which were used to praise Emperor Wu (武后), were in their prose. However, their memorial discussions containing various implications were their “bright color.” Comparatively, Cui’s literary achievements we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Li’s for several reasons. First, Cui’s prose is richly embellished with allusions and quotations. Second, Cui is good at writing parallelisms in the Lianzhu (連珠) style. Third, his tendency for three-word sentences made his syntax more changeable. We further discuss “wenzhang” (文章) in Wenzhang Siyou, which includes poetry and prose, but mainly examine the latter. The ranking of wenzhang siyou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four writers.

Keywords: “Wenzhang siyou,” Li Qiao, practical prose in the Tang Dynasty, Cui Rong